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战略

田新文¹, 胡宗山²

(1. 咸宁学院 社科部, 湖北 咸宁 437005;

2.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 田新文(1969-), 男, 湖北赤壁人, 咸宁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胡宗山(1972-), 男, 安徽庐江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摘 要] 在外交学学科建设和对外战略构建中, 应该重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作用, 同时, 保持合适的距离。未来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应该寻求利益政治与规范政治的契合与统一。崛起后的中国应该寻求差别战略与模糊战略, 既牢固把握现有的权势地位, 同时也应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 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和全人类利益。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学; 崛起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5-0763-06

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历来是学术争鸣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领域, 这种争鸣最终体现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现实, 更重要的是, 它能否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导。于是, 追求主客观的相符程度, 特别是理论对外交政策的指导价值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进程中, 理论与现实之间似乎并不是“零距离”接触的。早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理论对当时美国外交的影响较大, 其后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以权力政治为基本信条, 却并不受美国人的欢迎。相反, 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自由、人权等似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1] (第 21-24 页)。到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虽然理论实现了科学的简约, 但与现实的关系似乎更远了。至于建构主义, 仿佛完全走进了象牙塔, 只能在一些个案问题上寻找说服力。冷战后, 理论的影响似乎有所加强。例如, 众所周知的“民主和平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林顿政府“民主、人权、外交”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米尔斯海默等人也一直在追求通过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教义来为美国冷战后的新战略提供学术基础^[1] (第 543-545 页)。

总体而言, 就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来看, 严格的、成形的、规范的理论似乎远远不如那些零星的、不成体系的思想、世界观、信仰、信条等的影响更大。例如, 历史上对美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两大战略, 一是华盛顿告别致辞中所涉及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 二是门罗主义。它们影响美国历史达 100 年之久, 但几乎都不是理论。影响英国几百年之久的均势思想始自亨利八世时代, 历经多位君主、首相而不衰。相反, 以科学、简约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难以在现实中找到什么作用和影响。即使在其最盛的 20 世纪 80 年代, 指导美国外交的不是结构观、系统论, 而是现实的权力观与美国内在的意识形态使命; 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几乎看不到对美国制度合作的影响。中国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 领导人的思想成为对外战略的指南, 而学者们能做的似乎只是解释、说明领导人的思想。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战略制定

这似乎令人不解,按说理论更为科学和系统,解释力、说服力和预测力更强,应该影响更大。之所以出现理论与现实间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理论自身的问题。众所周知,理论具有三个功能:描述、解释和处方。所谓处方,就是为现实行为提供政策咨询或建议,但是在这三个功能中,解释功能是核心功能,理论首要关注的是自身对规律或现象的解释是否符合逻辑,处方功能只是在解释正确之后,依据其结论得出的,因此,处方功能是建立在解释功能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家不同于谋士,不同于战略家。预测、规划未来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第二,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历来复杂。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有限性古今中外都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清谈误国”。理论具有稳定性、滞后性,而实践是易变的、纷繁复杂的。理论即使能够指导现实,那也只是指导较长时间的战略性行为,因此,与其说国际关系理论指导外交政策,不如说指导外交战略制定更为恰当。

第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与现实差距较大。国际关系在社会科学中又是一个后进学科,学科建设尚在不断发 展,远未达到成熟之巅,出现差距是非常正常的。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比自然科学家不敬业、不努力,也不是不如他们聪明,而是由于二者处理的变量不同。自然科学处理的变量是自然事物,基本上是纯客观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科学则无法完全摆脱主体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影响。何况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变量特别多,影响同一问题的因素远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单一,多因多果的情况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效仿自然科学,力图通过科学程序,按严格的自变量、因变量关系来构建理论,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间仍难以避免存在较大的差距。

第四,理论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预测和指导功能也不同。沃尔兹曾经区分过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他认为以摩根索、基辛格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主要是国家(单元)层次的理论,解释的是地位相同的国家为什么其行为是不同的,因而对国家外交政策涉及较多。而他自己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属于国际政治理论,是体系(结构)层次的理论,它解释的是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是描述国际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理论。沃尔兹认为自己的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并且告诫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不要将普遍性理论当作外交政策理论^[2](第 82-83, 96, 161 页)。此外还有研究方法的问题。传统现实主义主要采取历史—人文分析方法,本身就是通过大量的历史个案总结来认识规律、构建理论的,其中不乏对各国外交战略的研究,在提炼理论精髓的同时,其警句箴言自然也可以为外交政策或战略提供借鉴。而科学方法则是纯粹的理论演绎或统计计量分析,对外交政策而言,只有结果是有用的,过程可以忽略不计。

第五,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区别。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因环境、氛围、立场、信息不同而有所区别。学术研究讲究自身的周延和逻辑一致,追求科学的简约和片面的深刻,它的生命首先不是体现在对政策有多大用处,而是自身是否正确或科学。政策研究则追求可行性、可操作性、能否被当局所采纳,面对的具体事例更为丰富、复杂和多变。在当今中国,除了外交部门的专业政策研究部门外,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学术机构承担的是政策研究或准政策研究,即发挥智库或思想库的作用。而在西方,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思想库尽管可以为美国内外决策提供很大的作用,但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国际关系学科之列。

第六,学者所处的立场与政治家立场不一样。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学者可以在自己的框架内任意驰骋,他只须对真理负责,对自己负责(甚至什么也不负责)。但政治家不同,他们是制定或执行政策的主体,诚如基辛格所言,政治家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3](第 19 页)。当然,二者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要看具体情况。例如,作为政治学者的威尔逊作了总统之后,理想主义的理论自然就会对美国外交产生巨大影响。同样,现实主义学者基辛格入幕白宫之后,和尼克松一拍即合,美国开始扭转 20 世纪 60 年代

过分注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转以现实政治和权力平衡为首要考虑要素,大玩三角外交。

就原则而言,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寻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正确关系定位。但从具体情况看,理论与现实之间似乎还应有一定的差距,或者说,实现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合理定位是学科生命力的真正所在,完全等同不行,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行。

虽然同为国际问题学科,但外交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很大不同。它更集中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甚至主要探讨的是官方外交的行为艺术。一般来说,外交学应该有外交理论、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不同的层面。相对成熟的外交学科应该在上述四个方面,尤其是理论和战略层面有较先进的发展水平。但相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来说,外交学的事务性、技术性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就是在美国,外交学中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也要稍逊一筹,而且集中在外交决策理论研究上,外交学科中更多的内容仍然属于外交战略,或者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对外战略或大战略。当然这种大战略浸透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理论之中,是在深刻洞悉理论原理和精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只是几个名词术语的简单套用;大战略不仅来自国际关系学科,也来自历史、经济等各个学科,是多学科交汇的产物。因此,要真正使外交学科上台阶和等级,就必须在理论和战略两个方面借鉴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各种理论,并使二者很好地结合,使理论对外交战略的制定发挥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指导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教义

新中国的外交学科建设和外交实践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战略的关系问题。外交学学科建设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相比相对落后,那么,如何借鉴和利用这两个兄弟学科的有益经验,特别是运用相对成形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提高外交学理论和战略的水平,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外交学科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加强同一性研究,二者有分有合,“分”体现在外交学有一部分是事务性、技术性研究;而“合”则体现在理论和战略的层次,三个学科应该互相借鉴和利用,共同构筑平台,尤其要注意如何将现有理论借鉴、运用到外交实践中,例如,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建言献策,为透视和分析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对外战略、对华战略提供智力资源;又从各国的外交实践中来进一步观察、检验理论。总之,要加强二者的互动式研究。

同时,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是世界观式和指导、借鉴性的,在涉及外交战略时,也是提供原则性规则,不要指望去干涉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的具体内容。要把学术性的理论创建与为外交战略提供指导作用有效分离,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替代外交学建设,也不能要求所有人、所有理论、任何情况下都致力于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构建。有的理论可能就是脱离实际的纯粹的象牙塔构建,这是理论或学科自身建设的问题。理论家不是战略家,理论的作用在于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不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①。理论对于对外战略的价值体现在用理论来形成观察世界事务、制定战略的根本思维方式。

就中国的外交实践而言,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值得探讨。

一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两张皮”现象。这虽然有利于为理论研究构筑相对平静的氛围,但老不加入世贸组织也不是件好事。从近两年来看,这种现象有所改善。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从自己的学术立场来观察、思考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的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例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其实在各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们也知道,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指导原则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别是当前,各国基本上是走新中间路线,都希望对二者进行最佳的综合,但如何取舍,何时取舍,何种情况下取舍都值得探讨。

二是如何确定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倾向。1978年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兼具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的,但从决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仍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

待问题,甚至一度过分地意识形态化,至少在宣传和语言使用上主要采取革命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提出以利益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语言转换模式也向此演变,基本摆脱了过去的革命外交观,而代之以国家利益观。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一直强调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身份,在两极格局时代,它有利于团结中小国家等中间力量,对抗超级大国。但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急剧变化,如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上都强调这一身份,而不进行具体调整,有时也会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和争取。事实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不仅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尤其是在增量经济方面也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地位和角色没有清醒认知,仍然按照若干年前的经济地位定位来考虑问题的话,可能并不利于我们实行正确的对外行为。实际上,近年来这一问题日渐突出。如在处理与 G8 的关系、在联合国中处理大国关系与小国关系、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宣传、世贸组织谈判、中国未来崛起的国际环境等问题上,中国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三是未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如何适应国家定位。中国的崛起已经无法阻挡,中国现在有点类似于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未来中国何去何从,亟须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构建高明的而又符合实际的崛起战略,以与未来中国的国家地位相适应。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固然与其硬实力有关,但与其有一大批战略家,为其未来发展出谋划策不无关系。中国真正关注未来发展战略的战略家、“纵横家”太少,而热衷于阐释、研究具体政策的人太多。因此,外交学科建设的一个当务之急是致力于中国未来的大战略构建。大战略的构建是综合性的工作,它要求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全面、完整的了解和把握,要求对国际社会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只有在理解和洞察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大战略。

在未来中国对外战略的主线方面,我们认为应该把握利益政治和规范政治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向未来的中国应该既关注自身的利益,也关注全人类的利益;并适当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一问题说到底现实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所谓现实政治,是指“根据对国家实力及国家利益的计算而制订的外交政策”^[3](第 130 页),内容包括权力政治、均势、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利益交换等,它的判断标准是国家的自身利益,特别反映了国家对安全、权力、生存等现实国家利益的追求,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可以牺牲遵守规则和道德原则。现实政治是国家自利原则的典型体现,它建立在实力政治基础之上,反映了国际政治基本规律运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结果。道德政治与现实政治相对应,反映了国家对外实践中对共同规则的遵循和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追求。道德政治体现的是国家对自身利益和自身所界定的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道德政治更多依据的是人类普遍原则和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体系,如果遇有分歧,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它追求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个体利益的统一,并通过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会议等民主化的手段来加以实现。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以正义和普遍原则为幌子,以道德政治为借口,实际上追求国家一己之利的行为不是真正的道德政治,而是一种披着道德外衣的霸权政治。只有那些将本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国际社会中主持正义、坚持真理、倡导和平、反对霸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道德政治。

现实政治和道德政治对应的理论形态分别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它们都有过不光彩的名声,前者曾被贬抑为强权政治,后者则被讥讽为乌托邦主义。但实际上,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内核,前者如实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后者则反映了人类对美好和进步的追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摒弃现实政治中强调对外扩张和称霸的成分,而关注它对国家“自助”、自我防护的重视,那么它的一些基本战略和政策取向对于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确实是十分有益的,也有助于提醒国家在自身利益上理性、谨慎地行事。同样,摒弃道德政治中那些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输出倾向,而真正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推进全人类普遍利益,无疑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人类的整体前进。同时,现实政治和道德政治又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反映了国家的利益诉求和规范诉求的相互关系问题。道德政治建立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没有强大的实力为基础,没有对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保障,国家的道德政治诉求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只看重现实利益,而无视国家

在全人类共同利益方面的规范诉求,就会使国家缺乏理想,缺乏对人类进步和共同利益的关怀,会使国家堕入物质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短视与浅见之中,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和总体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利益中的公共利益成分越来越多,国家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类公共利益作贡献。当今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和开拓空间,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在涉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核心的国家利益上,遵循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秉承现实政治的基本原则,确保自身权益不受损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实力不断增强并志在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胸怀道德政治追求的远大抱负,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规范诉求。在坚持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参与、遵循并完善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体系,特别是要在遵守和倡导国际法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履行国际民主化而非国际霸权的程序来推进普遍道义原则的实施,以求造福于人类。

三、崛起中国的对外战略

纵观几千年崛起后大国的对外战略,不难发现有两条主线,一是暴力方式,通过战争进行领土征服。例如古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都是通过长年征战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拿破仑法国、德国和日本也都曾企图通过侵略战争征服地区和世界;另一种是运用和平的方式。英国虽然也对殖民地发动过侵略战争,但殖民对象大多是前国家地区,相对于法、德直接进攻主权国家来说,英国的行为无疑更为收敛,在大英帝国后期,英国更多地运用自由贸易、谈判、绥靖等和平手法来解决纷争,这就使得它的影响力更为持久,国家发展也避免了大起大落。美国进一步吸取英国的教训,它不企求像欧洲列强那样建立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地,也不准备去征服它弱小的美洲邻国;相反,它一方面接过英国自由贸易的旗帜,另一方面则用反殖民主义来拆毁大英帝国,力图用新的理念、新的制度(典型地体现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国联、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设计中),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试图更多地运用软实力来建立自己的霸权(当然,这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上的)。这种大战略的变迁之路令人深思。事实证明,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霸权并不长久,国运也会迅速萧条,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帝国分崩离析。相反,越是和平的方式,越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理念和制度,越能更持久地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

这些历史事实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未来崛起之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战略,才能对人类有更大贡献?

首先,在政治影响方面,中国不应追求霸权式的影响力,而应寻求巨头式的影响(如同古罗马的几大执政寡头一样)。这是因为,尽管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霸权国,但霸权本身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不符合人类进步要求。无论是古代帝国式直接的占领统治,还是如美国的间接控制,都会像吉尔平预言的那样,霸权的统治成本逐渐上升,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最终导致帝国或霸权分崩离析;这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本土,大英帝国的崩溃对当今英国的影响仍是深远的。但是,中国在权势问题上仍然应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不但要维护现有的“五常”权力,还应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影响。因为,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权势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重要武器。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任上一天,诸如台湾进入联合国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出现,除非中国有致命的外交失误。此外,在诸如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在应对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崛起等方面都应该更多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当然,如何做得更为巧妙则是外交技巧的问题。

其次,中国应该坚持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来对抗大国政治规则,用多边主义的战略合作来挑战单边主义控制,将权力平衡与制度合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当今中国的崛起环境与历史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当历史上新的国家崛起时,老的霸权国已经开始衰落。如英国之对荷兰、美国之对英国;但今天的霸权国美国不但没有衰落,在冷战以后,实力还在进一步上升。挑战或动摇这种硬实力的国际单极格局,只有运用自由主义的理念武器。中国只有用新的理念来瓦解霸权一单边阵营,

团结受霸权控制的其他国家共同行动,才能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既定战略。

再次,虽然现存的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但应该看到,中国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和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这一体制之中,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通过革命的、激进的方式来挑战现有的国际体制和秩序。相反,中国必须坚持主动参与、积极推动、伺机修改的原则来对待现有的国际制度和秩序,积极参与到更多的、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之中,首先成为游戏者,再利用自己实力的增强,逐步成为新的游戏规则制订者、老的游戏规则的完善者和修订者。

总体而言,中国应该学习英国人和美国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寻求执行差别战略和模糊战略。就长期而言,中国执行差别战略,即与美国有区别:美国追求单边主义,我们强调多边外交;美国高唱人道主义干涉,我们诉诸主权理论;美国搞大国外交,我们力图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坚持单极主导,我们倡导多元合作。但在短期而言,我们应执行模糊战略,即在上述问题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是唱高调,有些则见真章;在国家利益上,则道德政治和利益政治并存,外柔内刚,但在涉及诸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上决不退缩。

注 释:

- ① 有关学与术的关系,可参见庞中英:《区别“学”与“术”、“学者”与“术者”——以“术”为规范的对象》,地址:<http://www.irchina.org>.

[参 考 文 献]

- [1]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 [美] 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信 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M]. 顾淑馨, 林添贵,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叶娟丽)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 Diplomatic Strategies of China

TIAN Xinwen¹, HU Zongshan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Xianning College, Xianning 437005, Hubei, China;

2. Institute of Politic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TIAN Xinwen (1969-), mal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Xianning College, majoring in MAO Zedong's thoughts; HU Zongshan (1972-),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studies and foreign strategies, we should lay the stress on the reference role of the theories on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keep a proper distance in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future foreign strategies of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seeking the agreement and unification of interest politics and norm politics. China, already risen, should pursue discrepancy and fuzzy foreign strategies.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on the one hand, maintain the present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create new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gain the maximum benefit of China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diplomatic studies; rising